

十三经导读

(下)

党怀兴 主 编
白玉林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

SHISANJING DAODU

国学教育新书

《春秋左传》概论

一、春秋

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被称为“六经”，即六部经典著作。此说最早见于《庄子·天运》和《礼记·经解》，其中《春秋》为春秋时期鲁国的史书，据说后来经过了孔子的修订，因此上升到经书的地位。在春秋时期，除鲁国的史书称作《春秋》外，其他一些国家的史书也多称作《春秋》，如《墨子·明鬼篇》所提到的“周之《春秋》、燕之《春秋》、宋之《春秋》、齐之《春秋》”等，不过有少数国家的史书则采用了另外的名称，如《孟子·离娄下》提到晋国的史书称《乘》，楚国的史书称《檮杌》。

（一）《春秋》的作者

关于《春秋》的作者有两种对立的说法：一种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据鲁史修成；另一种认为《春秋》非孔子所修，而是鲁国的旧史。孔子所修说见于《孟子》、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司马迁《史记》及《报任安书》、杜预《春秋左传集解序》等较早的文献：

世衰道微，邪说暴行有作，臣弑其君者有之，子弑其父者有之。孔子惧，作《春秋》。《春秋》，天子之事也；是故孔子曰：“知我者其惟春秋乎！罪我者其惟春秋乎！”……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，周公兼夷狄，驱猛兽而百姓宁，孔子成《春秋》而乱臣贼子惧。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下》）

是会（指僖公二十八年冬温之会）也，晋侯召王，以诸侯见，且使王狩。仲尼曰：“以臣召君，不可以训。”故书曰：“天王狩于河阳。”言非其地也，且明德也。壬申，公朝于王所。（《左传·僖公二十八年》）

九月，侨如以夫人妇姜氏至齐。舍族，尊夫人也。故君子曰：“《春秋》之称：微而显，志而晦，婉而成章，尽而不汙，惩恶而劝善，非圣人谁能修之？”（《左传·成公十四年》）

十二年春，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。（《春秋·昭公十二年》）

“伯于阳”者何？八子阳也子曰：“我乃知之矣。”在侧者曰：“子苟

知之，何以不革？”曰：“如尔所不知何？《春秋》之信史也，其序，则齐桓、晋文；其会，则主会者为之也；其词，则某（某，一本作丘）有罪焉尔（其文辞若有不当，则是我孔丘有罪了）。”（《公羊传·昭公十二年》）

十有四年春，西狩获麟。（《春秋·哀公十四年》）

何以书？记异也。何异尔？非中国之兽也。然则孰狩之？薪采者也。薪采者则微者也，曷为以狩言之？大之也。曷为大之？为获麟大之也。曷为为获麟大之？麟者，仁兽也。有王者则至，无王者则不至。有以告者曰：“有麋而角者。”孔子曰：“孰为来哉，孰为来哉？”反袂拭面，涕沾袍。颜渊死，子曰：“噫，天丧予！”子路死，子曰：“天祝予！”西狩获麟，孔子曰：“吾道穷矣。”（《公羊传·哀公十四年》）

子曰：“弗乎，弗乎，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。吾道不行矣，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？”乃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上至隐公，下迄哀公十四年，十二公。据鲁、亲周、故殷，运之三代，约其文辞而指博。故吴楚之君自称王，而《春秋》贬之曰“子”，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，而《春秋》讳之曰“天王狩于河阳”，推此类以绳当世。贬损之义，后有王者举而开之。《春秋》之义行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。孔子在位听讼，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弗独有也。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弟子受《春秋》，孔子曰：“后世知丘者以《春秋》，而罪丘者亦以《春秋》。”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
太史公曰：“五帝、五代之记，尚矣。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，周以来乃颇可著。孔子因史文次《春秋》，纪元年，正时日月，盖其详哉。至于序《尚书》则略，无年月，或颇月，然多阙，不可录。故疑则传疑，盖其慎也。”（《史记·三代世表序》）

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，於是论次《诗》、《书》，修起礼乐。适齐闻韶，三月不知肉味。自卫反鲁，然后乐正，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得其所。世以混浊莫能用，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，曰：“苟有用我者，期月而已矣。”西狩获麟，曰：“吾道穷矣。”故因史记作《春秋》，以当王法，以辞微而指博，后世学者多录焉。（《史记·儒林列传》）

上大夫壶遂曰：“昔孔子何为而作《春秋》哉？”太史公曰：“余闻董生曰：‘周道衰废，孔子为鲁司寇，诸侯害之，大夫壅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，道之不行也，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，以为天下仪表，贬天子，退诸侯，讨大夫，以达王事而已矣。’……夫《春秋》，上明三王之道，下辨人事之纪，别嫌疑，明是非，定猶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，存亡国，继绝世，补敝起废，王道之大者也。”

壶遂曰：“孔子之时，上无明君，下不得任用，故作《春秋》，垂空文以

断礼义，当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，下得守职，万事既具，咸各序其宜，夫子所论，欲以何明？”……

（太史公）退而深惟曰：“夫《诗》书隐约者，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里，演《周易》；孔子厄陈蔡，作《春秋》。”（《史记·太史公自序》）

是后或力征，强乘弱，兴师不请天子。然挟王室之义，以讨伐为会盟主，政由五霸，诸侯恣行，淫侈不轨，贼臣篡子滋起矣。齐、晋、秦、楚其在成周微甚，封或百里或五十里。晋阻三河，齐负东海，楚介江、淮，秦因雍州之固，四海迭兴，更为霸主，文武所褒大封，皆威而服焉。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莫能用，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春秋，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烦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决。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）

古者富贵而名磨灭，不可胜记，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。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，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。（司马迁《报任安书》）

韩宣子适鲁，见《易·象》与《鲁春秋》，曰：“周礼尽在鲁矣。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。”韩子所见，盖周之旧典礼经也。周德既衰，官失其守。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，赴告策书，诸所记注，多违旧章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，考其真伪，而志其典礼，上以尊周公遗制，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，文之所害，则刊而正之，以示劝戒。其余则皆即用旧史，史有文质，辞有详略，不必改也。故传曰：“其善志（语见《左传·昭公三十一年》）。”又曰：“非圣人孰能修之？”盖周公之志，仲尼从而明之。（杜预《春秋左氏传序》）

由于以上几种文献在古代典籍中的重要影响，特别是《史记》作为一种信史的权威地位，故孔子修《春秋》说为多数学者所信从，范文澜（《中国通史》）、白寿彝（《中国史学史》）、卫聚贤（《古史研究》）、苏渊雷（《读春秋及三传札记》）及沈玉成（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）等学者均持是说。

持《春秋》非孔子所修说的学者无论在古代还是今天都是少数派。第一个对孔子修《春秋》发生怀疑的学者是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（其说见《史通·惑经》）。北宋时期，王安石曾讥《春秋》为“断烂朝报”^①。既然视为“断烂朝报”，则自然不会认为《春秋》是孔子所作。近、现代持是说的学者可以顾颉刚、钱玄同和杨伯峻先生为代表。顾氏的观点见于《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》。

^① 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：“（安石）黜《春秋》之书，不使列于学官，至戏目为‘断烂朝报’。”

钱氏通过古文字与“孔壁古文经”的对比否定了孔子与六经的联系，他在《〈左氏春秋考证〉书后》中说：

我近来取甲骨刻辞及殷周两代之钟鼎款识与《三体石经》中之“古文”相较，更了然于“孔壁古文经”中之字体（《三体石经》中“古文”即系根据“孔壁古文经”者），一部分是依傍小篆而略变其体势，一部分是采取六国破体省写之字，总之决非殷周之真古字。由此更知“孔子书《六经》，左丘明述《春秋传》，皆以古文”之为谰言；而“孔壁古文经”本无此物，全是刘歆的伪造，实为颠扑不破之论也。^①

仅凭个人对甲骨文、殷周金文与《三体石经》中古文的比较即肯定“孔壁古文经”全都是刘歆的伪造，这种说法未免太武断了。杨氏在《春秋》^②一文和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^③中均对《春秋》为孔子作的说法进行了否定，其证据主要有三：

其一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经文都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记“庚子，孔子生”，《左传》经文于鲁哀公十六年记“夏四月己丑，孔丘卒”。孔子不可能写自己某日死，也不会写自己某日生。

其二，《春秋》的笔调前后不一致，这说明其体例不统一。例如鲁隐公、鲁桓公时，无论是盟会还是统军作战，《春秋》都不写外国卿大夫的姓名，但从鲁庄公二十二年开始，《春秋》于结盟时会写出外国卿大夫的姓名，从鲁文公八年开始，《春秋》于盟会时同时会写出鲁国和外国卿大夫的姓名。又如鲁僖公以前，《春秋》多称某国君为某人，不称某侯，僖公以后，仅秦、楚两国之君偶称“秦人”、“楚人”，鲁宣公五年后，所有诸侯均不称“人”而称“爵”，如“秦伯”、“楚子”等。

其三，前人说孔丘著《春秋》意在“寓褒贬，别善恶”，实际上并非如此，太史有死者，有继承者，因此书法各不相同。古本《竹书纪年》是晋国、魏国的历史文献，其所记与《春秋》同，如“陨石于宋五”一语两书所记无异，这说明当时宋国把观察到的天象通报给各国诸侯，各国史官记了下来，何尝是孔丘的笔墨？

至于《春秋》的作者到底是谁，杨氏在《春秋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回答：

我认为，孔子教学生，不能不教他们近代和现代史，《春秋》一书，孔子不过曾用它作过教本罢了。《春秋》本是鲁国官书，由此传到民间，由孔

① 《钱玄同文集》第四卷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1999。

② 文史知识编辑部：《经书浅谈·春秋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。

③ 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0。

门弟子传述下来，孔门弟子或者加上孔子生的年月日，或者加上孔子死的年月日，以此作为纪念而已。

杨氏在《春秋》一文中否定孔子作《春秋》的主要根据是书法，属于内证。在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中杨氏同时举了一些外证，如其中一条说：据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，孔丘作《春秋》的动机起于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之后，而孔丘于两年后即病逝，过了七十岁高龄的老翁用两年时间未必能完成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书。又如其中另一条说：《论语》作为记载孔丘和他的弟子言行的书，却没有一个字提到《春秋》，更没有提到孔子修《春秋》。杨氏所举的证据固然不少，但要推翻孔子作《春秋》的说法应该说存在着很大的困难，因为杨氏提出的问题多数都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，例如杨氏所说的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襄公二十一年经文“孔子生”一语，《左传》该年经文并无此语，前人（唐徐彦、杨士勋）早已指出此语属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追记的《春秋》传文，而非《春秋》经文。至于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关于孔子卒的记载也不难解释。《左传》哀公十五、十六年的《春秋》经文历来都认为是后人的续作，故十六年所记“孔丘卒”一语实际和孔子没有关系。

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，与其否定孔子修《春秋》，不如肯定孔子修《春秋》，因为毕竟有多种较早的文献记载了孔子修《春秋》之事，虽然有矛盾疏漏之处，但基本事实是一致的。沈玉成在《春秋左传学史稿》中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较充分的肯定意见，兹将其证据撮要说明如下：

第一，孟子上距孔子之卒仅一百多年，而且他是孔子学生子思的再传弟子，孔子作《春秋》对孟子来说只是近代史，故《孟子》所载必有根据，不至于向壁虚造。

第二，非儒家学派对《春秋》也有记载，如《庄子·天运》：“孔子谓老聃曰：‘丘治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六经。’”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：“鲁哀公问于仲尼曰：‘《春秋》之记曰：‘冬十二月，霰霜不杀菽。’何为记此？’”鲁哀公向孔子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不难窥见孔子和《春秋》之间存在着某种关系。又，《韩非子·外储说左上》记晋文公攻原，与大夫期十日，十日而不下，罢兵而去。卫人降晋文公。“孔子闻而记之曰：‘攻原得卫者，信也。’”这段记载多少透露出孔子和史官、史记有关的迹象。

第三，通过一些文献记载与今本《春秋》的比较，可以看出孔子笔削《鲁春秋》的痕迹。例如，《公羊传》庄公七年：“《不修春秋》曰：‘雨星，不及地尺而复。’君子修之曰：‘星陨如雨。’”今本三传经文都作“星陨如雨”。《不修春秋》显然就是《孟子》所说的“鲁之《春秋》”、司马迁所说的“史记”，即鲁国的国史，经过君子（即孔子）“修”了以后才变成今本《春秋》“星陨如雨”四个字。

又如,《礼记·坊记》:“未没丧,不称君,示民不争也。故《鲁春秋》记晋丧曰:‘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。’”这条史料今本《春秋》记作“冬十月,……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”(僖公九年)、“春王正月,……晋里克弑其君卓”(僖公十年)。通过对比可以看出今本《春秋》经过了笔削加工,这个笔削者,孔子应该是一个适当的人物。

第四,《公羊传》襄公二十一年经文记载此年十一月“孔子生”,《穀梁传》则记作十月庚子“孔子生”。《左传》哀公十六年经文记载“夏四月己丑,孔丘卒”。孔子作《春秋》不可能记自己的生卒年,这是《春秋》非孔子作之说的证据之一。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的经文原出经师口授,“孔子生”这三个字的记载必非经文原有而系窜入,《左传》经文即无此三字可证。至于《左传》哀十五、十六年的经文,历来就称之为“续经”,并非《春秋》原文,“孔丘卒”自然也是《左传》作者所记。

“公、侯、伯、子男”四等爵之说始见于《孟子·万章下》,现代的研究者据金文和其他典籍,认为这种严格的区别在《孟子》以前并不存在,可是在《春秋》中却同样严格区分,如“宋公”、“齐侯”、“晋侯”、“郑伯”、“楚子”、“许男”,丝毫没有错乱,可见《春秋》笔削者生活在孔子之后、孟子之前。

(二)《春秋》的价值及其书法

《春秋》一书相当于大事年表,共一万六千余字,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(前722年)至鲁哀公十六年(前479年,据《春秋左传》)共244年(据《春秋公羊传》、《春秋穀梁传》均止于鲁哀公十四年,故一说为242年)间发生在鲁国及其他各国中的重要事件。其记事体例为编年体,即以鲁国隐、桓、庄、闵、僖、文、宣、成、襄、昭、定、哀十二位君主在位的先后序次记事,年分季、季分月、月分日、日系事,秩然有序,一年之中可见各国之大事。

前人对《春秋》的评价极高,认为它具有上遵周公遗制,下明将来之法,更兴旧典,宣扬王道,劝善抑恶,维护周礼的重要作用。《左传》称其文:“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尽而不汙,惩恶而劝善,非圣人谁能修之?”(成公十四年)晋杜预认为:“周德既衰,官失其守。上之人不能使《春秋》昭明,赴告策书,诸所记注,多违旧章。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,考其真伪,而志其典礼,上以尊周公之遗制,下以明将来之法。其教之所存,文之所害,则刊而正之,以示劝戒。……故《传》曰‘其善志’,又曰‘非圣人孰能修之’,盖周公之志,仲尼从而明之。”(《春秋左氏传序》)唐孔颖达指出:“国之大事在祀与戎,祀则必尽其敬,戎则不加无罪,盟会协于礼,兴动顺其节,失则贬其恶,得在褒其善。此《春秋》之大旨,为皇王之明鉴也。”(《春秋正义序》)唐刘知几从史学的角度亦盛赞《春秋》“为不刊之言,著将来之法,故能弥历千载,而其书独行。”(《史

通·六家》)

抛开历代经师加在《春秋》上的过度溢美之辞不论,应该肯定《春秋》是一部具有重要史学价值的著作。首先,它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历史典籍,开创了编年体的史书体例。其次,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发生在我国的自然现象,是研究古代自然、地理的宝贵资料,内容涉及日食、月食、陨石、水灾、旱灾、虫灾、地震等。例如全书记载日食达三十六次之多,其中三十三次与现代天文学的推算完全相同。又如庄公七年所记“星陨如雨”和文公十四年所记“有星孛入于北斗”二事是世界文献中关于天琴座流星雨和哈雷彗星的最早记录。第三,它记载了春秋时期各国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状况,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研究春秋时期的历史提供了重要依据。如根据《春秋》的记载,春秋时期“弑君三十六,亡国五十二”,这使我们了解到当时政治斗争的残酷性和各国兼并战争的剧烈性。又如《春秋》记载:鲁国于宣公十五年实行“初税亩”制度,于成公元年实行“作兵甲”制度,于襄公十一年实行“作三军”制度,这些均反映了鲁国这一时期在政治、军事、经济体制方面的重大变革。第四,它记载了春秋时期的盟会、外交、礼仪、通婚等社会现象,使我们从中了解到在当时社会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重要活动。第五,它制定了一套相对严密系统的记事原则,这些原则及其精神在一定程度上对后代史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。

关于《春秋》的记事条例,前人有《春秋》书法之说。所谓《春秋》书法,是指《春秋》记事遵循的原则,例如《春秋·隐公七年》:

(七年春,王三月)滕侯卒。

《左传·隐公七年》指出:“不书名,未同盟也。凡诸侯同盟,于是称名,故薨则赴以名,告终称嗣也,以继好息民,谓之礼经。”根据《左传》的解释,《春秋》对于他国国君之卒的记载本着这样的原则:凡与鲁国有同盟关系者则书其名,否则则不书其名。上例中未书滕君之名,说明当时滕与鲁未建立同盟关系。书名的例子如《春秋·隐公三年》:

八月庚辰,宋公和卒。

《春秋》书法除遵循一定的记事原则外,前人还以为《春秋》的字里行间表现着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之义,借以达到惩戒后人的目的,即所谓寓褒贬于一字之间,例如《春秋·宣公四年》:

夏六月乙酉,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。

《左传·宣公四年》:“凡弑君,称君,君无道也;称臣,臣之罪也。”根据《左传》的解释,《春秋》在上句话中点了郑大夫“公子归生”及郑灵公“夷”的名,这样的用词表明《春秋》作者认为弑君事件中的臣为有罪之臣,君为无道之君,通过点名的形式以示贬斥之义。

《春秋》书法，前人多以为是孔子修订《春秋》时制定并使用，旨在体现圣人的微言大义。最早指出《春秋》书法的学者是东汉人何休，他在《春秋公羊注疏序》中说：“往者略以胡毋生条例，多得其正，故遂隐括使就绳墨焉。”西晋杜预著《春秋释例》一书对《春秋》书法进行了系统的总结，他认为《春秋》的书法多被《左传》所发明，《左传》中以“凡”字起头的语句均属对《春秋》书法的揭示（如上例）。根据杜预的统计，《左传》中用“凡”的语句共五十处，即所谓“五十凡”。

《春秋》是否有一个一以贯之的严密笔法？是否每一字都寓有褒义或贬义？这是《春秋》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。汉代及汉代以后的学者多数都坚信《春秋》笔法的存在，他们往往把探讨《春秋》笔法阐释圣人微言大义作为研究《春秋》的最高目标，但也有不少学者对《春秋》笔法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怀疑或否定，这些学者如唐孔颖达，宋苏轼、郑樵、朱熹，元吴澄、程端学，清朱鹤龄、顾炎武、顾栋高等人。其中代表性的说法如：

以《春秋》为褒贬者，乱《春秋》者也。（郑樵《春秋考·自述》）

凡说《春秋》者，皆谓孔子寓褒贬于一字之间，……此之谓欺人之学。（郑樵《通志·灾祥略》）

《春秋》大旨，其可见者，诛乱臣，讨贼子，内中国，外吴楚，贵王贱伯而已，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义也。想孔子当时，只是要备二、三百年之事，故取史文写在这里，何尝云某事用某法，某事用某例邪？若欲推求一字之间，以为圣人褒善贬恶专在于是，窃恐不是圣人之意。（《朱子五经语类·卷十七统论经义》）

如果摒弃各家的门户之见客观地看问题，应该承认《春秋》笔法肯定是有，因为作为一部史书不可能没有它的记事条例，就《左传》的“五十凡”来看，多数说法都符合实际情况。不过由于《春秋》历时二百四十余年之久，记事非出自一人之手，许多代人的书法不可能尽同，即使经过孔子的修订也不可能完全改变原来的记载——重写，所以把《春秋》书法抬到十分严密乃至神圣的地位是不可相信的。例如《春秋》共记弑君三十三例（据《春秋大事表·春秋乱贼表》），其中二十三例书“弑”，二例书“杀”，八例书“卒”，同样是君主被杀，而用词不一。在书“卒”的八例中，五例涉及鲁国国君（其中鲁桓公遇害于齐），三例涉及郑、楚、齐三国国君。同样的用词，涉及的对象却有鲁国国君与他国国君的不同，论者以为鲁君被弑用“卒”，是圣人不忍言君被弑而讳言“弑”之故，郑、楚、齐三国国君被弑用“卒”是鲁史从赴（讣）之故，实属弥缝之说，不足为训。从唐代起历代都有人指出《春秋》书法有不统一之处，例如：

推寻经文，自庄公以上弑君者皆不书氏，闵公以下皆书氏，亦足以明时

史之同异，非仲尼所皆贬也。（孔颖达《春秋左传正义》）

《春秋》者，鲁史之旧文也。《春秋》总十二公之事，历二百四十年之久，秉笔而书者必更数十人。此数十人者，家自为师，人自为学，则其书法，岂能尽同？（清）石韞玉《独学庐初稿·春秋论》）

向华国问：僖传（指《左传·僖公二十九年》），卿不会公侯。《春秋》叙公及大夫会盟，以此为例，弗用旧史，或没公不书，如及齐高傒、及晋处父诸盟，不称公，不使卿得敌公也。或贬卿称人，如狄泉、邢丘，以及襄公廿六年澶渊诸会，没卿名称人，贬卿所以尊公也。此皆仲尼新意，所以辨等列、明贵贱也。然僖二十五年，公会卫子、莒庆，盟于洮，例以赵武会公，莒庆亦应书人。澶渊之会，良宵以不失所进之不贬，兹莒庆以再命见经，尤为殊例，岂以其释怨修好进而殊之与？求之同例，未得其证。又成二年，公会楚公子婴齐于蜀，例以处父之盟，亦应没公不书。杜以蔡、许君为说，不知蔡、许失位贬爵称人，且会未尝叙蔡、许，与公奚涉？私揣嘉楚来会，亦进而殊之，但无例可证，敢并质之。^①

至于寓褒贬之说尤不可信。《春秋》作者在制定编写条例时要受到政治、礼制、道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难免带上主观倾向，这是完全可能的，如维护周礼、为尊者亲者讳等，但不可能做到字字都寓有褒贬，句句都是微言大义。事实上，在《春秋》一书中只能勉强找到部分表示贬义的用语，而很难找到表示褒扬的用语。一些今文学家为了肯定其说，多在“爵号名氏”的存舍上大做文章，甚至挖空心思在一般用词甚至日月的记载上探求褒贬，实属误入歧途。例如：

《春秋·隐公三年》：“春，公会戎于潜。”东汉何休注：“书‘会’者，恶其虚内务恃外好也。古者诸侯非朝时不得踰竟。”孙复注：“诸侯非有天子之事不得出会诸侯，凡书‘会’，皆恶之也。”^②

本来一个普通的“会”字，被说成了贬义词。又如：

《春秋·隐公元年》：“（冬十有二月）公子益师卒。”《左传》：“众父卒，公不与小敛，故不书日。”《公羊传》：“何以不日？远也。所见异辞，所闻异辞，所传闻异辞。”《穀梁传》：“大夫日卒，正也。不日卒，恶也。”^③

鲁公子益师卒而未书其卒日，这本来是史家略记的正常事，却被《左传》、《穀梁传》与贬义联系在一起，且三家之说各不相同，可见贬义之说纯属臆测。

① 刘师培：《春秋左氏传答问》，引自《清儒得失记》，48页，北京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1。

② 《春秋三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。

③ 《春秋三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。

宋人刘敞曾对三家说进行了驳正：

公子曰公子，公子之子曰公孙，公孙之子以王父字为氏。公子之尊视大夫。大夫三命然后氏，死则卒之。公子益师卒，正也。《左氏》曰“公不与小敛，故不书日”，非也。公孙敖、叔孙婁、公孙婴齐皆为公与小敛乎？何以得书日？大凡《春秋》所据者，史也。史之所记，有日不日，有月不月，其事可以考核，其日月不可必知也。《穀梁》曰“日卒，正也；不日卒，恶也”，非也。公孙敖、仲遂、季孙意如，岂正者乎？而皆日。叔孙得臣不闻有罪，而反不日，皆妄也。^①

《春秋》一书迎合了统治者的需要，因而一出现即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，有不少学者为之作传，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所载，为《春秋》作传的学者共有五家，即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、《邹氏传》和《夹氏传》。其中《左氏传》、《公羊传》和《穀梁传》流传至今，《邹氏传》无承传之师，《夹氏传》无解说之书，故此二家其后湮灭无闻。在西汉时期，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的地位均高于《左传》，被立于学官，作为国家最高学府的讲授课程；《左传》则处于被排斥的地位，但其史学价值、文学价值以及语言学价值均远远高于《公》、《穀》二传，自东汉至今，一直受到人们高度的重视。

二、《左传》的作者、宗旨及成书年代

关于《左传》的作者、宗旨及成书年代历来存在着较大的分歧，其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四种：

1. 《左传》成书于春秋晚期，为传《春秋》而作，作者是左丘明

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杜预《春秋左氏传·序》基本上代表了这种观点：

是以孔子明王道，干七十余君莫能用，故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兴于鲁而次《春秋》，上记隐，下至哀之获麟，约其辞文，去其繁重，以制义法，王道备，人事浹。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，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，各安其意，失其真，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（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》）

古之王者，世有史官，君举必书，所以慎言行、昭法式也。左史记言，右史记事；事为《春秋》，言为《尚书》，帝王靡不同之。周室既微，载籍残缺，仲尼思存前圣之业，乃称曰：“夏礼吾能言之，杞不足征也；殷礼吾能

^① 《春秋三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7年影印本。

言之，宋不足征也。文献不足故也，足则吾能征之矣。”以鲁周公之国，礼文备物，史官有法，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，据行事，仍人道，因兴以立功，就败以成罚，假日月以定历数，藉朝聘以正礼乐。有所褒讳贬损，不可书见，口授弟子，弟子退而异言。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，故论本事而作传，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。《春秋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，有威权势力，其事实皆形于传，是以隐其书而不宣，所以免时难也。及末世口说流行，故有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、《邹》、《夹》之传。四家之中，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立于学官，《邹氏》无师，《夹氏》未有书。（《汉书·艺文志序录》）

其（指班彪）略论曰：“唐虞三代，《诗》、《书》所及，世有史官，以司典籍，暨于诸侯，国自有史，故《孟子》曰‘楚之《杗杌》，晋之《乘》，鲁之《春秋》，其事一也。’定、哀之间，鲁君子左丘明论集其文，作《左氏传》三十篇，又撰异同，号曰《国语》，二十一篇。由是《乘》、《杗杌》之事遂暗，而《左氏》、《国语》独章。”（《后汉书·班彪传》）

左丘明受经于仲尼，以为经者，不刊之书也，故传或先经以始事，或后经以终义，或依经以辩理，或错经以合异，随义而发。（杜预《春秋左氏传·序》）

根据以上所记可知，司马迁、班固、班彪、杜预均肯定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左丘明。按照《十二诸侯年表》、《艺文志序录》及《春秋左氏传·序》的说法，《左传》是因孔子《春秋》而作。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（孔子生于鲁襄公十二年，即公元前551年；卒于鲁定公十六年，即公元前479年），左氏既然受经于仲尼，则其生活的时代及著《左传》的时间亦当在春秋末期，班彪更明确指出《左传》的成书时间是在春秋末期的鲁定公、哀公时期。

2. 《左传》成书于战国初期，作者是孔子学生子夏的再传弟子，或是吴起（以其居地左氏为名），或是另外的人

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近人章太炎、钱穆、卫聚贤、徐中舒、杨伯峻等人。

《左传》的记事最晚到鲁哀公二十七年，其中最后一段涉及智伯被灭、赵襄子其人等史实：

悼之四年，晋荀瑶帅师围郑，未至，郑驷弘曰：“知伯愎而好胜，早下之，则可行也。”乃先保南里以待之。知伯入南里，门于桔柣之门。郑人俘酈魁垒，赂之以知政，闭其口而死。将门，知伯谓赵孟：“入之。”对曰：“主在此。”知伯曰：“恶而无勇，何以为子？”对曰：“以能忍耻，庶无害赵宗乎？”知伯不悛，赵襄子由是甚知伯，遂丧之。知伯贪而愎，故韩、魏反而丧之。

鲁悼公为哀公之子。哀公于其二十七年（前467年，或说为468年）卒，悼公于是年立，起元在前466年。悼公四年为前463年，三家灭智伯在悼公十三年，即前453年。赵襄子死于前425年。襄子为谥号，其名曰无恤，“这”意味着作者知其死年之事。悼公四年上距孔子卒年（前479年）有十六年，三家灭智伯上距孔子卒年有二十六年，赵襄子死年上距孔子卒年有五十四年。孔子终年七十三岁，假设左丘明与孔子同年，则《左传》记事到鲁悼公四年时左氏需活到八十九岁，记事到三家灭智伯时左氏需活到九十九岁，记事到赵无恤死时左氏需活到一百二十七岁。左氏能活到如此高龄似不大可能，即使活到如此高龄而能坚持完成《左传》的撰写也不大可能，这是此派认为《左传》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的重要理由。此外，《左传》好讲预测，一些预测的事情到了战国初期，多数都很灵验，这是此派将《左传》成书时间确定在战国初期的重要理由。例如庄公二十二年记载，陈大夫懿氏占卜认为将女儿嫁给齐大夫田敬仲很吉利，五世之后田氏（即陈氏）将成为齐国的执政大臣，八世之后将没有人与之抗衡。果然，田氏的后代在齐国日益强大。至五世陈桓子时败强族栾、高二氏，始大于齐；至七世陈成子时杀相弑君，专权于齐；至十世太公和时终于夺取了齐国的政权立为诸侯。陈成子见于鲁哀公十四年，已在春秋之末。据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，陈成子之子襄子盘，盘子之子庄子白，子之子太公和。襄子盘为齐宣公之相，时已在战国初期，其间晋三家灭掉智伯。又如《左传·闵公元年》载：

晋侯作二军，公将上军，太子申生将下军。赵夙御戎，毕万（魏氏之祖）为右，以灭耿、灭霍、灭魏。……还，为太子城曲沃。赐赵夙耿，赐毕万魏，以为大夫。……初，毕万筮仕于晋，遇屯之比，辛廖占之，曰：“吉。……公侯之卦也。公侯之子孙，必复其始。”

毕万是周代毕国国君毕公高的后代，所谓必复其始是指毕万的后代必然又会成为国君。果然毕万后代到魏文侯时，魏始由晋分出，文侯成为国君。魏文侯元年为公元前445年，这时也已经到了战国初期。

《左传》中的预测多数吻合事情的发展结果，在古代看来是很灵验的，是善恶应得的报应，在今天看来完全是作者根据结果制造的欺人之作。懿氏卜田敬仲“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”（《史记·田敬仲完世家》），说明作者见到了田氏家族在战国初期夺取齐政权的事实，辛廖占毕万后代“必复其始”成为国君，则说明作者看到了战国初期魏文侯立为诸侯的事实。

最早提出《左传》完成于战国时期并且确定了具体时间的学者是卫聚贤，他在《古史研究》中推断《左传》成书应在周威烈王元年到二十三年之间（即前425年到前403年之间）。作出这一断定的主要根据就是《左传》中使用的谥号，其中赵襄子这一谥号出现的时间最晚，是在公元前425年，故《左传》的成书时

间不能早于此年。卫氏又认为毕万占卦中“公侯之子孙，必复其始”一语为推测语气，因而断定《左传》作者只见到了韩、赵、魏三家的强大而并没有见到三家分晋和各自为侯的局面，遂得出结论说：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前史事的卜辞都应验了，而涉及周威烈王初年以后史事的卜辞都没有应验，因此《左传》当撰成于周威烈王初年。

徐中舒在《左传选·后序》一文中作了这样的论证：^①

左丘明是孔子同时人，亲见孔子，而《左传》作者能预知三家分晋、田氏代齐，这两件事都远在孔子以后。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，而三家分晋在公元前403年，距孔子没已七十七年；田氏代齐在公元前386年，距孔子没已九十四年。《左传》作者不但能预知三家分晋（按：《左传》预测的是三家灭智伯）、田氏代齐，又能断言郑国先亡（见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九年）或郑先卫亡（见昭公四年）。郑国灭亡在公元前375年，距孔子没已一〇四年。这些历史都不是孔子同时的人所能前知的。据此言之，《左传》成书的年代必远在孔子以后。

韩愈说：“《春秋》谨严，《左氏》浮夸”，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。《左传》中预言有验的也有不验的。凡验的预言，可以说都是事后比附之词。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的预言，书中屡见，《左传》作者应是看见这些历史的。

凡不验的预言其初都似有验证。《左传》又在秦穆公死以人殓葬时断言“秦之不复东征”，东征指向晋用兵而言。魏文侯、武侯时，魏攻取秦河西地，阻绝秦国东向用兵道路。

《左传》作者只看见魏国攻夺秦河西地断绝了秦国东征道路，因此，就断言“秦之不复东征”；后来魏献河西、河东地于秦，又完全出于《左传》作者预料之外，因此，这个预言也就不验了。

《左传》作者对于魏国期望是很大的。他在晋赐毕万以魏时说：“毕万之后必大。万，盈数也；魏，大名也。以是始赏，天启之矣！”他只看见魏国的强大，却没看见魏国的削弱，《左传》就是魏国霸业鼎盛时代的作品。把《左传》成书年代定为公元前375年—公元前351年，也与这一个不验的预言相符合的。

孔子卒于公元前479年，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，孔子卒时子夏年二十八。子夏居西河为魏文侯师，当是晚年时事。相传子夏老寿，晚年丧明。假定当时子夏年七十，即公元前437年，下距《左传》成书年代的上限为七十

^① 徐中舒：《左传选》，341～367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63。

二年（应为六十二年），因此，《左传》作者可能就是子夏一再传的弟子。

杨伯峻在《左传》一文中就这一问题作了类似的推断：

《左传》作者好讲预言。预言灵验的，便是《左传》作者所目见耳闻的；不灵验的，便是预测错了，他未尝料想到的。他说毕万之后代一定昌盛而恢复为公侯，证明他曾见到魏文侯为侯，却不曾见到其后称王。那么由此可以推测，《左传》作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（公元前403年），即魏斯称侯以后。

《左传》的作者不可能是左丘明，因此我们不纠缠作者为谁的问题。但著作年代却在战国初期，公元前403年以后。……我们可以大胆推定，《左传》成书在公元前403年以后，公元前386年前，离鲁哀公末年约六十多年到八十年^①。

在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中杨氏对《左传》在战国流传的情况进行了考察，为《左传》成书于战国时期提供了另一重要证据：

《史记·十二诸侯年表序》说：“铎椒为楚威王传，为王不能尽观《春秋》，采取成败，卒四十章，为《铎氏微》。赵孝成王时，其相虞卿上采《春秋》，下观近势，亦著八篇，为《虞氏春秋》。”

司马迁上文所谓《春秋》，实指《左传》，前人已定论，现在不再重复。读者参考近人金德建《司马迁所见书考司马迁所称春秋系指左传考》也足以了如指掌。不然，《春秋》在当时最多不过一万八千字，为什么“为王不能尽观”？《春秋》和《左传》近二十万字，才“为王不能尽观”。孔颖达在《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序·疏》中引刘向《别录》也说：

“铎椒作《抄撮》八卷，授虞卿。虞卿作《抄撮》九卷，授荀卿。”

《别录》的二种《抄撮》，就是司马迁的《铎氏微》和《虞氏春秋》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铎氏微》三篇，班固自注说：“楚太傅铎椒也。”又有《虞氏微传》二篇，班固自注说：“赵相虞卿。”那么，铎椒、虞卿节录《左传》成书，不但武帝时司马迁看过，刘向、刘歆整理西汉末皇家藏书时，并曾整理过，这是十分可信的。而且，《战国策·楚策四》并有下列一段文字：

虞卿谓春申君曰：“臣闻之《春秋》，‘于安思危，危则虑安。’”

“于安思危”二语，实际就是对《左传》襄公十一年“居安思危，有备无患”的引意。古人引书，一般不拘泥于文字，只是大意相同便够。

铎椒为楚威王太傅，因作这书。楚威王元年为公元前三三九年，末年为前三二九年，铎椒作《铎氏微》或《抄撮》，不出这十一年之间，足见战国时代的上层人物都喜爱《左传》。虞卿的年代大概在公元前三〇五—前二三

^① 《文史知识》编辑部：《经书浅谈·左传》，83~84页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84。

五年。从这以后征引《左传》的更多。刘师培《群经大义相通论》中有《左传荀子相通论》，其中虽不免有附会之处，但荀子征引《左传》，实无可疑。

其后《战国策》（如《魏策三》用僖公二年和五年《左传》，称《左传》为《春秋》）、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无不征引《左传》文字。《吕氏春秋》、《韩非子》二书征引尤多。刘师培有详细考证，见《读左劄记》。^①

杨氏的看法与卫、徐二家十分接近，所不同的是卫氏没有具体提出《左传》的作者，徐氏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是子夏的再传弟子，而杨氏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难以确定，也没有必要在此问题上纠缠。

章太炎认为《左传》的名称不是来自人名，而是来自地名，即来自战国时期吴起的居住地左氏。章氏虽然没有明确说明《左传》的成书年代是在战国初期，但结论是显然的。他在《春秋左传读·丘明》中说：

《韩非·外储说右上》曰：“吴起，卫左氏中人也。”左氏者，卫邑名。《内储说上》曰：“卫嗣君之时，有胥靡逃之魏，因为襄王之后治病。卫嗣君闻之，使人请以五十金买之，五反，而魏王不予。乃以左氏易之。”注：“左氏，都邑名也。”《左氏春秋》者，固以左公名，或亦因吴起传其学，故名曰《左氏春秋》，犹《诗传》作于大毛公，而《毛诗》之名因小毛公而题与。以左氏名《春秋》者，以地名也，则犹《齐诗》、《鲁诗》之比与。或曰：本因左公得名，及吴起传之，又传其子期，而起所居之地为《左氏》学者群居焉（犹齐之稷下），因名其地曰左氏。以人名地，则党氏之沟之比也。因有以《韩非》之文证《左传》为吴起作者，故发此二义正之（今曰《左传》，若左氏本由地得名，则今所称为割裂，犹呼《公羊》、《穀梁》曰《公》、《穀》矣）。^②

依据《韩非子·外储说右上》“吴起，卫左氏中人也”一语及《韩非子·内储说上》之注文“左氏，都邑也”，联系到吴起曾传《左氏》之学，遂推断《左传》是因吴起居地而得名，循此而论，《左传》的成书年代即在战国初期，而其作者也就与吴起有关了。章氏的这一说法不无道理。

章氏的观点到了钱穆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，钱氏明确认为《左传》的作者就是吴起，他在《先秦诸子系年·吴起传〈左氏春秋〉考》中通过清人姚鼐及日人狩野直喜之说而断定前人把《左传》的作者视为左丘明实是因书名而造成的误会。接着论道：

余考诸《韩非》书：“吴起，卫左氏中人也。”然则所谓《左氏春秋》

① 杨伯峻：《春秋左传注·前言》，北京，中华书局，1990。

② 章炳麟：《春秋左传读》，《辛太先全集》第2册，上海，上海人民出版社，1982。

者，岂即以吴起为左氏人故称，而后人因误以为左姓者耶？

又按：《艺文志》，《易》有《淮南道训》，《诗》有《鲁说齐杂记》，《论语》有《燕传说》，《五经异义易》有《下邳传》，此皆以地名系者，则亦何疑于《左氏》？

《说苑》：“魏武侯问元年于吴子。”此亦吴起传《春秋》之证。晋汲县人发魏襄王塚，有《师春》者，即采《左氏》，亦可见《左氏》书与魏之关系焉。^①

除以上五人外，郭沫若、朱东润、赵光贤等人亦均持战国说。其中郭氏同意《左传》作者为吴起之说（见《述吴起》，收入《青铜时代》）。朱氏认为《左传》成书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期，即公元前400—前360年之间，理由是《左传》只预见到魏国的强盛而没有预见到其衰亡，《左传》预见到了赵氏有内乱，《左传》记秦国之事自殽之战后逐渐减少，直到秦孝公即位（前362年）后才发生了改变。赵氏认为《左传》经过了改编，改编者是战国人，改编的时间在公元前375—前352年之间，他的根据主要也是《左传》中的预言和占筮。

3. 《左传》成书于战国中期以前，是一部由历代学者相继完成的集体性著作，始于春秋末的左丘明

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主要有清人顾炎武、姚鼐及今人沈玉成等人。顾炎武在《日知录·卷四》中说：

《左氏》之书，成之者非一人，录之者非一世，可谓富矣。而夫子当时未必见也，史之所不书，则虽圣人所不知焉者。……《左氏传》采列国之史而作者也。故所书晋事，自文公主夏盟，政交于中国，则以列国之史参之，而一从周正；自惠公以前，则间用夏正。其不出于一人，是矣。^②

顾氏认为《左传》作者非一人一世的主要证据是《左传》中使用的历法不够统一，晋文公称霸期间全部使用的是周历，而在惠公以前除了使用周历外还间或使用了夏历。使用的历法不同，即意味着作者的不同。姚鼐可以说是第一个系统阐述《左传》非由一人所成的学者，他在《左传补注·序》中说：

《左氏》之书非出一人所成。自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，申传吴起，起传其子期，期传楚人铎椒，椒传赵人虞卿，虞卿传荀卿。盖后人屡有附益。其

① 钱穆：《先青诸孙年·吴起传〈左氏春秋〉考》，224页，北京，商务印书馆，2001。

② 顾炎武：《日知录·卷四·春秋阙疑之书》，黄汝成集释，179页，上海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6。